

弗兰克与西部西藏历史研究

——兼论西部西藏考古的发端^{*}

杨清凡

内容摘要：本文回顾了德国藏学家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的生平与学术经历，并对其历史与考古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着重对他在西部西藏考古中的学术成就予以分析和评价。弗兰克在古藏文碑铭研究、藏区佛教考古等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甚至尝试将体质人类学运用于西藏考古中。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藏学、体质人类学、印度考古及碑铭学等都在此期间初步建立起现代学科体系，弗兰克的成就与上述学术背景密不可分。对弗兰克相关著作与成就的深入思考，是厘清西藏考古早期学术史的重要一环。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藏传佛教密教遗存考察：以7-15世纪五方佛图像及信仰为中心》（11YJC780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物考古中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1&ZD121），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西藏夏鲁寺美术遗存调查与研究》（14BF060）的阶段性成果。

基督教摩拉维亚教会 (Moravians, 德 Evangelische Brüderunität)¹ 于 1853-1930 年期间进入西喜马拉雅地区² 进行传教活动, 在西方传教士到亚洲传教的历史上, 这或许不过是其在东方活动版图中并不显赫的一角, 但就藏学研究领域而言, 赴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摩拉维亚传教士们堪称现代学术意义上西部西藏研究的拓荒者, 其中的数位早期传教士后来都成为杰出的学者, 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 (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 年) 就是成就最为丰硕的一位。近年来, 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对保存在欧洲、印度各地的档案资料进行搜集、整理, 重新勾勒出了弗兰克等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所从事考察、研究的历史轮廓。本文拟对弗兰克的生平与学术经历、历史与考古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进行介绍, 并对其在藏西考古中的学术成就试做评价与分析。

弗兰克著作中将其在西喜马拉雅活动及考察的主要区域称为 “Western Tibet”, 主要涵盖拉达克 (Ladakh), 以及周边的巴尔蒂斯坦 (Baltistan), 印度喜马偕尔邦的拉胡尔 (Lahore)、斯比提 (Spiti), 属于西藏传统所称 “阿里三围” 的西北部地区, 即 “玛域 (མ་ཡུལ་)” 的主体地域, 是中国古代西藏的一部分。直至 19 世纪 30 年代, 随着查谟道格拉人武力入侵, 相继占领拉达克、巴尔蒂斯坦, 之后英印政府非法单方面划定拉达克与西藏边界, 并将拉达克纳入查谟与克什米尔邦, 人为割裂了拉达克与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

1 摩拉维亚教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 起源于 1457 年成立的波西米亚弟兄会 (Bohemian Brothers)。1722 年波西米亚弟兄会 (Bohemian Brothers) 从故乡逃离迫害, 应新生铎夫伯爵 (德国虔信派教徒, 后成为摩拉维亚教派的主教) 的邀请定居在上部卢萨蒂亚 (Upper Lusatia) 的主护村 (Herrnhut)。1727 年, 摩拉维亚教派成为独立的基督教派别。早在 1732 年, 摩拉维亚教派已经开始传教活动, 此后迅速扩展到全球。主护村作为早期的中心仍然是档案资料的主要保存地。Hartmut Walravens (Berlin State Library), "The Moravian mission and its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Western Tibet", *Oriens Extremus* 35, 1992: 159-169.

2 西喜马拉雅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 指的是包括今印度境内拉达克、斯比提、拉胡尔在内的区域, 没有与之相吻合的确切的自然或行政边界, 学术界对该词的使用多出于习惯用法而不是精确的地理概念。英印帝国时期, 克什米尔是大的土邦之一。印巴分治之后, 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约 52.5% 的地区 (9.4 万平方公里), 成立查谟-克什米尔邦, 主要包括克什米尔谷地、查谟、拉达克、锡亚琴冰川四部分。拉达克地区面积约为查谟-克什米尔邦的一半, 其居民、文化与中国西藏地方相近, 和西藏地方古代历史上的古格王国关系密切。详 Romi Khosla,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the Western Himalaya*, Kathmandu: Ratna Pustak Bhandar, 1979: 17-18.

历史、文化联系³。本文将弗兰克著作中所谓 Western Tibet 对译为“西部西藏”，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以区别于作为行政区划概念的中国“西藏西部阿里地区”。

一、弗兰克的生平与学术经历

(一) 早期教育与职业⁴

弗兰克的背景和早期经历具有浓厚的摩拉维亚教会影响。1870年11月5日，弗兰克出生于德意志帝国西里西亚省 (Silesia)⁵ 格纳德弗雷镇 (德 Gnadendorf, 波兰 Piława Górna, 今波兰西南下西里西亚省上皮瓦瓦镇)，他的外祖父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弗兰克 (Christian Friedrich Francke) 是一位摩拉维亚传教士，曾在南非进行传教工作。C.F. 弗兰克是 18 世纪神学家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 (August Hermann)

3 据吐蕃以来的汉藏文献所载史料，证明拉达克在 9 世纪以前应属于象雄的一部分，受吐蕃王朝管辖；13 世纪元朝时，作为西藏的一部分统一于中国版图，直至 19 世纪初，清朝政府仍然在西藏拉达克地区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1834 年 7 月 -1839 年，爆发了所谓“道格拉 (Dogra) 战争”，附属于锡克王国 (Sikhs) 的克什米尔地区查谟土邦王公 (the Maharajah of Jammu) 古拉伯·辛格 (Gulab Singh, 后成为印度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大君，是查谟的道格拉族首领) 入侵拉达克，拉达克人多次反抗并曾派人至拉萨求援，却因当时清朝驻藏大臣处置不当，致使拉达克最终为道格拉侵占。古拉伯·辛格继而在 1840 年出兵侵占拉达克西北的巴尔蒂斯坦，1841 年又开始入侵中国西藏西部，中国史称“森巴战争” (《清实录》、《清史稿》等古籍载相关史实，以“森巴番夷”等称呼道格拉人)。时驻藏大臣孟保派藏军赴阿里，于多玉 (རྟུ་ལྷ་མོ་ལྷ་མོ་，今玛法木错南) 决战击溃道格拉军，至 1842 年 3 月收复阿里境内被侵占地区。但在之后 4-5 月拉达克列城附近被道格拉援军大败。9 月 17 日 (藏历水虎年八月二十三日) 西藏地方政府与道格拉双方代表于列城谈判，签订停战协议，承诺维持旧有边界和贸易。然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因战争失利，未能将道格拉入侵者赶出拉达克，协议中也没有就拉达克问题订立清晰条款，致使拉达克此后仍继续为道格拉长期侵占的事实。此后，1846-1847 年，中英双方商划定英国所属克什米尔与中国西藏边界，英印政府在完全没有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单方面划定拉达克和西藏边界，实际也仅只从斯比提到班公湖这一段西藏与拉达克边界上确定了若干点，这样的划界是非法、无效的。拉达克与西藏历史上原均属于中国领土，它们之间的分界从未经正式划定，只有一条传统的习惯线。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这段边界也从未经中国政府与英印或印度政府正式划定。关于拉达克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历史关系，详可参见如下文章：周伟洲：《19 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中国藏学》1991 (1)：54-69；黄博《试论古代西藏阿里地域概念的形成与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3)：130-138。国外的一些著作中也有类似论述，如 Siddiq Wahid, *Ladakh, between earth and sky*. Lausanne: Edita, S.A., 1981: 13-20.

4 从事拉达克历史研究的约翰·布雷 (John Bray) 对弗兰克已发表学术著作、传教士工作汇报，及 1896-1906 年间弗兰克从拉达克寄回主护村教会的信件、年度工作报告档案进行整理，勾勒出了弗兰克早期及在西喜马拉雅传教期间的较详细经历。参见 John Bray, "August Hermann Francke's Letters from Ladakh 1896-1906: the making of a missionary scholar", *The Tibet Journal*, v.33, 2008 (1): 3-28.

5 西里西亚地区位于欧洲中部，自 1742 年以来大部分为普鲁士占领，至 1945 年以前一直属于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及纳粹德国领土的一部分。二战结束后，1945 年，据《波茨坦公告》，西里西亚绝大部分地区归属波兰，另有小部分地区归属捷克、德国。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lesia.

Francke, 1663–1727 年) 的后裔, A.H. 弗兰克便是以这位先祖之名而命名⁶。

弗兰克在家乡小镇自幼接受摩拉维亚教会教育, 此后到尼斯基 / 上劳希茨 (Niesky/Oberlausitz, 位于今德国萨克森州东部) 的摩拉维亚教师培训学院学习; 1891-1895 年间, 他任职于德国东南部包岑 (Bautzen) 附近 Kleinwelka 一所摩拉维亚教会寄宿学校, 成为一位深受孩子们爱戴的教师。在此期间, 弗兰克还开始学习其他语言如梵文, 关注地方文化和风俗, 在一次苏格兰之旅中, 他踏访古堡、素描写生, 搜集民谣, “一位未来的喜马拉雅旅行家和拉达克历史、语言及史诗爱好者的身影已隐然可辨”。

1895 年初, 弗兰克离开 Kleinwelka, 赴英格兰德比郡费尔菲尔德 (Fairfield, Derbyshire) 的摩拉维亚学院, 学习希腊语、希伯来语, 并于是年 11 月接受赴印度传教的任务。1896 年 3 月, 他被任命为执事, 4 月即启程前往拉达克。促成弗兰克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的探索之旅由此开启。

(二) 在拉达克等地的传教活动及考察研究

西喜马拉雅地区并不是摩拉维亚教派最初计划开展传教活动的目的地。从 18 世纪以来, 摩拉维亚教派就努力尝试在中亚蒙古游牧部族中开拓教区, 并曾于 1765 年一度在伏尔加河 (Volga) 流域 Czarizin 附近建立教会驻地。但这一尝试在 1821 年不得不中止, 因为沙俄政府拒绝给摩拉维亚传教士发放过境许可。1853 年被选派到蒙古传教的威廉·海德 (Wilhelm Heyde) 和路易·帕格爾 (Louis Pagell) 原计划从西伯利亚进入中亚地区, 在借道沙俄的申请被拒后, 被迫改变路线, 尝试取道印度拉达克前往游牧于新疆北部的卡尔梅克 (Khalmaks) 蒙古地区。但他们再次遇到阻碍——他们的行程被禁止超出拉胡尔 (Lahaul), 由于克什米尔地方政府不同意在当地建传教点, 他们只得选择杰朗 (Kaelang, 又作 Kyelang/Kyelong, 是印度喜马偕尔邦拉胡尔和斯比提地区的行政中心) 建立暂时传教点, 因为杰朗邻近拉达克, 当地居民至少与蒙古人种有关, 且也信奉佛教。海德等希望在这里等待时机继续行程, 然而, 这个机会再也没有来到⁷。

在 1896 年左右, 摩拉维亚教团在西喜马拉雅地区已经建立了杰朗、列城等传教点。

6 Gerald H. Anderso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222, sub. "Francke, August Hermann (1870-1930)".

7 1897 年于拉胡尔出版的《康格拉地区方志》(*The Kangra District Gazetteer*) 中详细记述了摩拉维亚教团在拉胡尔的活动, 这些来自 A.W. 海德本人的讲述道出了摩拉维亚教会进入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历史缘由。详参 Tobdan & C.Dorje, *Moravian Missionaries in Western Trans-Himalaya (Lahul, Ladakh and Kinnaur)*, New Delhi: Kaveri Books, 2008: 11-12, 18-19.

弗兰克于1896年6月8日抵达拉达克(Ladakh)首府列城(Leh);1897年与安娜·狄奥多拉·维茨(Anna Theodora Weiz)结婚,安娜是一位摩拉维亚传教士的女儿,后来也参与到他的藏学研究中。1899-1906年间,他被调任到卡拉孜(Khalatse,藏文地名མལ་ཁ་ཙེ,属于今印度的查谟与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区),3年间在这里做了大量考察;1906-1908年调任至拉胡尔的杰朗,并于此年被任命为英国及外国圣经协会荣誉成员。1909-1910年,应英印政府之邀,弗兰克开始了至西部西藏边界的研究之旅,研究成果汇集为两卷本巨著《印度藏区的古代遗物》(*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1, Calcutta, 1914; Vol.2, Calcutta, 1926)。

1910年,他返回德国,受委任在那里继续《圣经》的藏文翻译工作。1911年,弗兰克被布雷斯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eslau)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14年,圣经协会派弗兰克赴拉达克,这次旅途中他得以经过俄国和中国新疆(Eastern Turkestan)地区,并受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的委任进行考古收集(详参见其报告*Durch Zentralasien in die Indische Gefangenschaft*. Herrnhut, 1921. 171pp.)。弗兰克9月10日抵达列城后,于10月4日被英印政府监禁于艾哈迈德纳格尔(Ahmedagar,位于今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战俘营(POW),直至1916年3月。在战俘营里,他向学界同行们继续学习梵文、中文,他则教授他们藏语文。

(三) 后半生与德国藏学研究⁸

1916年,弗兰克被释放回德国,随即参加战时服役,被选派到罗马尼亚担任印度战俘营的翻译。1918年,在塞尔维亚(Serbia)作为战俘被拘禁,1919年7月再次获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从塞尔维亚获释之后,弗兰克终于返回德国并开始从事藏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他获得哥廷根科学院(Göttingen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项研究基金资助,对柏林国家图书馆(the Prussian State Library in Berlin)藏苯教写本《赛米》(གཟིང་ཕྱིལ)进行校勘、翻译。在弗兰克1930年去世之前,这部多卷本巨著共计约1/3部分已经在《泰东》(*Asia Major*)期刊上刊载了藏文原文和译文。

在时任柏林大学古代印度语言与文学教授的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

8 托尼·赫伯(Toni Huber)教授等据柏林大学所藏相关档案,梳理了柏林大学藏学研究的学术史,其中提供了A.H.弗兰克任职期间的详细信息,本节主要参考了其研究成果。Toni Huber and Tina Niermann, "Tibetan Studies at the Berlin University: A Brief Institutional History", In P. Maurer & P. Schwiieger (eds.), *Tibetstudien: Festschrift für Dieter Schuh zum 65. Geburtstag*. Bonn: Bier'sche Verlagsanstalt, 2007: 95-122.

以及艾里希·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1880-1966 年) 的鼓励下, 弗兰克完成了他的申请任教资格论文, 并以此于 1922 年 7 月 25 日获得柏林大学任教资格。1922 年 12 月 1 日, 柏林大学与弗兰克签署了任教协议书, 接替赫尔曼·贝克 (Hermann Beckh) 承担藏语文的教学。1925 年 7 月 21 日, 弗兰克被授予特聘教授 (special professor without civil servant status, 德 nichtbeamteteter au Berordentlicher Professor) 职位, 担任此职直至 1930 年去世。

此后在柏林大学担任教授的数年中, 苯教一直是弗兰克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 他完成了重要苯教文献《赛米》的一系列开拓性翻译工作。弗兰克在柏林大学期间, 正值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中亚进行四次考察之后, 其丰富成果极大促进了德国东方学研究, 柏林也因此成为当时的中亚研究学术中心之一。弗兰克也关注吐鲁番的新发现, 应民族学博物馆 F. W. K. 穆勒 (F. W. K. Müller, 1863-1930 年) 及突厥学者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年。1902-1914 年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主要参与者) 的特别邀请, 着手对吐鲁番收藏品中藏文写卷的编目与研究, 解读、刊布了一些藏文文献⁹。此外, 他还继续保持了早期传教士生涯中的一些兴趣及学术传统, 如与藏族牧师约瑟格根 (Yoseb Gergan) 合作继续《圣经》的藏文翻译工作。作为柏林大学首位藏学讲席教授, 弗兰克与其他同事合作积极而愉快, 在柏林大学举办了东方语言研讨课系列, 参加他的藏语文班的, 不但包括有当时顶级的德国东方学家, 也有后来成为德国各大学藏学及其他东方学领域的顶尖学者。这些学者包括印度学及佛教学者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 (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 年。后任哥廷根大学梵文教授), 时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的奥托·弗兰克 (Otto Francke, 1863-1946 年), 沃尔特·西蒙 (Walter Simon, 1893-1981 年, 弗兰克与他合编了耶什克的《藏语语法》第 3 版), 艾里希·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1880-1966 年。后接替奥托·弗兰克在柏林大学的教席), 以及约翰内斯·舒伯特 (Johannes Schubert, 1896-1976 年。后来成为莱比锡大学蒙古学和藏学教授) 等。

弗兰克的妻子安娜·狄奥多拉·维茨 (Anna Theodora Weiz) 是一位摩拉维亚传教士的女儿, 1875 年出生于南非, 1895 年弗兰克赴英格兰摩拉维亚学院进修期间两人相识。

9 August Hermann Francke, *Tibetische Handschriftenfunde aus Turfa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 Wiss. Phil.-hist. Kl.* 1924: 5-20, 110-118, etc. 相关发表成果, 参见 H. Walravens, M. Taube with M. Hahn, *August Hermann Francke und die Westhimalaya-Mission der Herrnhuter Brüdergemeinde: eine Bibliographie mit Standortnachweisen der tibetischen Drucke.* Stuttgart: Steiner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Suppl.-Bd.34), 1992: 78-87, nos. 151, 152, 166, 182, 185, 193, 194, 198.

1897年安娜不畏路途和环境的艰险，远赴列城和弗兰克结婚，但由于身体不能适应拉达克的高山气候，不久就不得不回德国居住并照顾和教育三个孩子。她于1945年在二战结束前去世。尽管狄奥多拉·弗兰克仅在拉达克居住了很短时间，她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却非常感兴趣，参与了弗兰克的部分藏学研究。她参与翻译了道格拉战争的口述记录，及《下部拉达克版的格萨尔史诗》(A. H. Francke eds., *A lower Ladakhi version of the Kesar saga*, Bibliotheca Indica No.168. Calcutta: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905-1941.XXXII, 493 pp.)¹⁰。

二、弗兰克的主要学术著作介绍

弗兰克在西喜马拉雅地区期间，对当地藏区的古代遗存、藏文文献、口述传统、民俗、民谣等都非常关注，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学术兴趣广阔，著述丰厚。据柏林大学执教藏学的托尼·赫伯(Toni Huber)等对柏林大学所藏相关档案进行整理研究，弗兰克在获得柏林大学任教资格前已经发表了研究成果140多篇/部。在他1930年去世之后，其部分手稿及著作作为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另一部分则因其学生约翰内斯·舒伯特的斡旋而收藏于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20世纪90年代以来，柏林国家图书馆哈特穆特·沃伦文(Hartmut Walraven)与莱比锡大学曼弗雷德·陶贝(Dr. Manfred Taube)、M.哈恩(M.Hahn)合作，对两地所藏弗兰克手稿一一检阅，搜集整理其著作信息，并公布了一份详细的著作目录，以及弗兰克与其他摩拉维亚传教士所搜集西部西藏资料的目录。据此目录，“弗兰克的出版文献占了不少于221项；柏林的手稿约占30项，莱比锡101项。主护村(Herrnhut)摩拉维亚教会档案中可能有两袋包括弗兰克资料的文档。这些资料包括有藏文文献如题刻文字、婚礼歌谣，讲座笔记，译文，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新疆搜集品的描述，等。”¹¹

笔者于此仅对弗兰克所著西部西藏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作品进行简要介绍与评价。

10 安娜·狄奥多拉·维茨简历，参见 Hartmut Walravens, "The Moravian mission and its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Western Tibet", 1992: 159-169.

11 Hartmut Walravens, "The Moravian mission and its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Western Tibet", 1992: 159-169.

(一)《西部西藏的古代藏文摩崖题刻》(*Tibetan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n rock and stone from West Tibet*)

弗兰克将拉达克(Ladakh)地区称为西部西藏(Western Tibet),当地保存有大量古代藏文摩崖题刻,但其对研究拉达克历史的价值在20世纪初尚未引起关注。弗兰克认识到这些藏文题刻对推进拉达克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因而在对其中大多数遗存亲自考察之后,抄录、编纂成为第一辑、第二辑¹²,分别于1906、1907年先后公开发表,即《西部西藏的古代藏文摩崖题刻(第一辑)》(*First collection of Tibetan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n rock and stone from West Tibet by A.H.Francke, 1906 <Erste Sammlung tibetischer historischer Inschrift auf Felsen und Steinan in West Tibet von A.H.Francke, 1906>*),共89条(No.1-89);《西部西藏的古代藏文摩崖题刻(第二辑)》(*Second collection of Tibetan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n rock and stone from West Tibet by A.H.Francke, 1907. <Zweite Sammlung tibetischer historischer Inschrift auf Felsen und Steinen in West Tibet von A.H.Francke, 1907>*),共55条(No.90-145)。这两个集子最初的发表均为手抄本形式¹³,弗兰克为每辑都用德文写有前言,正文部分即古藏文题刻,每处藏文题刻都用德文给出条目编号、名称(含发现地点、大致公元纪年的时间断代,部分还列出藏文题刻中出现的拉达克王名称),每则条目名称下为该藏文题刻的手写抄录文。弗兰克尝试在对题刻断代的基础上,将它们按时间顺序从早到晚依次排列,第一辑89条题刻时间大致为800-1790 A.D.,第二辑55条为975-1810 A.D.。

12 伯戴克文中提到,弗兰克于1906、1907、1908年在列城公布了《西藏西部的古代藏文摩崖题刻》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以复印本形式发行(Dr. Luciano Petech, *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Calcutta, 1939: 6* (Reprinted in Low Price Publication, Delhi, 1999))。在伯戴克1977年著作中,更详细地指出弗兰克在公布了第一、二辑之后,还继续收集了一些藏文题刻(编号146-211),伯戴克曾得以亲自查阅弗兰克未出版的手稿,看到过这些未刊的藏文摩崖题刻资料(Luciano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 (c.950-1842 A.D.)*,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3)。目前检阅到的资料中及其他学者对此的研究中均只有第一辑、第二辑,而未见第三辑。

13 弗兰克最初公开发表这两个专辑时应该都是采用手写本及其抄本或石印本的形式。在《跨西喜马拉雅地区(拉胡尔,拉达克,金瑙尔)的摩拉维亚传教士》(Tobdan & C.Dorje, *Moravian Missionaries in Western Trans-Himalaya (Lahul, Ladakh and Kinnaur)*, 2008: 73-152.)一书附录中,附有这两辑古藏文石刻的手写本影印图版;该书参考文献中列有两种相关文献,即A.H.Francke, *Erste and Zweite Sammlung tibetischer historischer Inschrift*, Leipzig, 1906. *First collection of Tibetan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n rock and stone from West Tibet, Kyelang, 1906. Second collection of Tibetan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n rock and stone from West Tibet, Kyelang, 1907.*但附录中未注明该手写影印本是引自莱比锡(Leipzig)版本还是杰朗(Kyelang)版本。Hartmut Walravens在"The Moravian mission and its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Western Tibet"一文注释11中说明,“第一辑1906年印行于杰朗,26页;第二辑为1907年,于杰朗,32页。仅复印发行40份”(1. Kyelang 1906. 26 pp; 2. Kyelang 1907. 32 pp, 40 copies only)。

弗兰克公布的拉达克地区古藏文摩崖题刻，并非全部都是他亲自实地考察和抄录的。在第一辑“前言”中，弗兰克特别详细说明：“我亲眼所见的有以下条目：Nos.1-5, 11-38, 42, 52, 55, 59, 61, 64, 66, 68-70, 74-76, 79-82, 84, 87, 88。此外，No.9 由巴尔蒂斯坦地区 Shigar 的 Reverend Gustafson 抄录，No.86 由列城的 Dr. F. E. Shawe 抄录”。此外，弗兰克还列出他已经或即将发表相关研究的条目，Nos.1-3, 5-8, 10-32, 35-37, 42, 45-52, 63, 67, 76, 87¹⁴。

由于诸多原因，弗兰克所搜集整理的拉达克地区古代藏文摩崖石刻资料集在其去世后很长时间内未能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甚至在 1939 年伯戴克出版其博士论文《拉达克王统记研究》(*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时，对于欧洲学者而言，弗兰克的“三册藏文石刻专辑”（伯戴克原文为“three collections”）的写本复印件仍然不易获得。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些石刻文献对《拉达克王统记》及拉达克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补证价值，以及弗兰克的开拓性工作中存在种种不足之处，伯戴克提出“亟需对拉达克的铭文、题记进行搜集整理和公布出版”。

印度学者普雷姆·辛格·吉纳 (Prem Singh Jina) 博士于 1983 年获得了弗兰克编纂《西部西藏的古代藏文摩崖题刻 (第一辑)》的手写本，在德国驻印度使馆的帮助下于 2000 年将德文前言及所有题刻的德文标题译成英文。在弗兰克已完成工作的基础上，普雷姆进一步尝试进行了藏文录文的校正、藏文题刻的拉丁转写和英文翻译，对部分词句进行注释¹⁵。这部著作的出版，是对弗兰克公布的拉达克藏文摩崖题刻第一辑中材料的迄今最完整的释读。但在结构的编排上，该书分为 5 章，即古藏文录文（实际也是以拉丁转写抄录）、拉丁转写录文（此处拉丁转写录文较之第一章录文有改动）、古藏文题刻的校勘、藏文题刻的英译文、注释及参考，从上述五方面分开对所有藏文题刻进行研究，作者本意认为这更符合一本书的完整体例，实则导致读者查阅一则藏文题刻需要分别翻阅五个章节的内容，极其不便；而且第二章的拉丁转写并不是严格参照古藏文，对相关改动的缘由、以及与第三章校勘之间的异同也未加解释，在对材料的释读和理解上极易造成混淆。普雷姆博士此前还曾出版《喜马拉雅拉达克地区的藏文题记与石刻》(*Tibetan manuscript and inscriptions of Ladakh Himalaya*)¹⁶，此书收集了拉达克地区的摩崖与玛尼石

14 "Preface", by A.H. Francke. In A.H.Francke, Prem Singh Jina, *First collection of Tibetan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n rock and stone from Ladakh Himalaya*, Delhi: Sri Sathuru Publications, 2003: vii-viii.

15 A.H.Francke, Prem Singh Jina, *First collection of Tibetan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n rock and stone from Ladakh Himalaya*, Delhi: 2003.

16 Prem Singh Jina, *Tibetan manuscript and inscriptions of Ladakh Himalaya*. Delhi: Sri Sathuru Publications, 1998.

上的藏文石刻、寺院墙壁上所书写的藏文题记及少量民谣抄本，共 49 条，其中 8 条为作者考察发现，其余 34 条源于弗兰克的著作及发表文章，5 条源于戴维·斯内尔格罗夫、塔德乌什·斯科鲁普斯基著《拉达克的文化遗产》卷一¹⁷。

(二)《拉达克王统记》(ལ་དྭགས་ཀྱལ་རབས) (整理、注译)¹⁸

拉达克历史最重要的资料是成书于约 17 世纪的《拉达克王统记》(*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Ladakh*, 藏 ལ་དྭགས་ཀྱལ་རབས)。《拉达克王统记》按内容可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弗兰克版本的第 1-3 章)为关于宇宙、神话的简述，第二部分(第 4-5 章)叙述吐蕃王朝历史(吐蕃起源传说至 842 年崩溃)，第三部分(第 6-7 章)叙述 1635 年之前的拉达克历史。据此，则《拉达克王统记》应成书于德丹南杰王(བདེ་ལྷན་རྒྱལ་ཀྱལ, 约 1610-1640 年)统治晚期，也即英勇的森格南杰王(སེང་གེ་རྒྱལ་ཀྱལ, 约 1580-1635 年)创建的拉达克王国短暂国祚中的顶峰时期。

这部文献中最具有历史价值的部分是第三部分中对拉达克地区各时期历史及王系的记载。其中的上半部分即约 900-1400 年之间基本只记载了一些人名，1400 年之后的内容则较前丰富。

1866 年，德国学者埃米尔·冯·施尔格威特(Emil von Schlagintveit)在慕尼黑首次公布了这一文献的一个不完整藏文本，并尝试用德文进行了翻译，文章以《西藏诸王》(*Die Könige von Tibet*)为标题发表于《巴伐利亚皇家科学院院刊》¹⁹。伯戴克在其博士论文的“引言”(Introduction)一节中评论道：“施尔格威特的译文已尽其所能，但限于当时欧洲藏学研究的条件，尤其因为缺乏好的藏文词典，其中充斥着各种今天看来全然不恰当的错误。”

摩拉维亚传教士认识到该文献的重要意义，以及施尔格威特公布的藏文版本中存在的不足，并找到了一份比前者更详细的藏文版本。这个藏文版本是由摩拉维亚传教士和医生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57-1891 年。安娜·狄奥多拉的姐夫)发现的，他采

17 David L. Snellgrove, Tadeusz Skorupski, Philip Denwoo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Ladakh: Central Ladakh*, Vol.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7.

18 对 ལ་དྭགས་ཀྱལ་རབས 研究史的梳理，详参 Luciano Petech, *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1939: 1-7. 以及 John Bray, "Readings on Islam in Ladakh: Loc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Himalaya,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Nepal and Himalayan Studies*, Vol.32, No.1, 2013: 13-21.

19 Emil von Schlagintveit, "Die Könige von Tibet",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 X (1866) III Abt.:793-879.

纳了达纳寺 (Stagna monastery) 高僧扎西旦沛 (བཀྲ་ཤིས་བསྟན་འཕེལ) 的建议, 发表了一份更为完善的英文译本, 在他去世后, 这些研究分三部分发表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上²⁰。遗憾的是, 马克斯在列城工作期间不幸患伤寒去世, 没能来得及对藏文原文进行最后的校勘和发表。这一工作后来由弗兰克继续完成, 在 1926 年出版的《印度藏区的古代遗物》第 2 卷中发表了经过校勘的藏文本及英文译文²¹。据弗兰克自述以及伯戴克的考证, 弗兰克在研究中使用了 5 个不同的写本²², 尽管他的初衷并非提供一个最终校勘本, 但他的研究对《拉达克王统记》各抄本中或多或少存在的模糊、残缺之处提供了所有可能找到的材料及探讨。

此后, 意大利学者伯戴克 (Luciano Petech) 在弗兰克整理和翻译版本的基础上, 进一步予以增订、校勘, 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拉达克王统记〉研究》(*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the University of Rome, 1939)。伯戴克对弗兰克关于《拉达克王统记》的研究予以极高的评价: “我曾尝试撰写一部拉达克史, 比弗兰克 1907 年出版的《西部西藏史》(*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London, 1907) 要晚得多。但由于此后一直没有新材料被发现, 我没能对已知的情况做较多增补; 弗兰克在此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无可比拟, 奠定了此后研究的基础。”伯戴克注意到, 就其所知的《拉达克王统记》各版本中, 大约只有 2 种是弗兰克没有参考的, 其一是肯宁汉在著作《拉达克: 自然, 统计与历史》(*Ladakh, physical,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London, 1854.) 关于拉达克历史部分所依据的

20 Karl Marx, "Thre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Ladakh: Tibetan text, translation and note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60 (1891): 97-135 ; 63 (1894): 94-107 ; 71(1902): 21-34. 马克斯公布的三份文献包括《拉达克王统记》及另外两份藏文文献。

21 A.H. Francke,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and Minor Chronicles: Text, and Translations, with Notes and Maps", edited with foreword by F.W. Thomas, M.A., Hon. PH.D.(Munich), Honorary Correspond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rchaeological Department.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26: 1-148.

22 弗兰克详述了他据以比对的 5 个《拉达克王统记》写本的具体信息, 见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1926:3-6。约半个世纪之后当伯戴克出版相关研究时, 这些写本有的已无法找到, 当时 5 个写本的情况依次如下: 1、写本 S (Ms.S), 现藏牛津大学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in Oxford, Ms.Tibet, C.7), 系于 1856 年抄写自拉达克前任国王所藏原件, Emil von Schlagintweit 于 1866 年发表。原件应已佚, 因为在铎官 (the Stog palace) 的前拉达克王室家族藏书室中未能再找到。2、写本 A (Ms.A), 其内容止于僧格南杰王统治时期。此写本的局部由 K. 马克斯 (K. Marx) 发表并翻译。现已佚。3、写本 B (Ms.B), 仅有 4 叶, 内容包括第二王朝至道格拉征服拉达克。现已佚。4、写本 C (Ms. C), 19 世纪末由贝杰 (Munshi Dpal-rgyas) 编纂, 增补了 3 份有关道格拉征服的附录。现已佚。5、写本 L (Ms. L), 现藏大英博物馆, 东方藏品 6683 号 (British Museum, Oriental Collection 6683)。记载了至德丹南杰王统治期间的历史, 并增加了一份此后至道格拉征服期间诸王的简要名录。详见 Luciano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 (C.950-1842 A.D.)*, "chapter 1, Sources",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2-3.

写本,此版本似较之其余版本均更完整,因为其中载有巴斯郭(Basgo)战役的时间(1646年),而弗兰克所用的抄本中对此均阙如,但遗憾的是此写本在肯宁汉之后一直不为世人所见;其二,大英博物馆藏写本(弗兰克收藏品写本)的第一部分较之其他写本更完整,弗兰克充分使用了该写本的第二部分,但却没有参阅其第一部分的创世传说,未在注释或附录中予以公布。此外,伯戴克也指出弗兰克在研究中的一些失误,例如,为了解释《拉达克王统记》第一、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之间关联性不大的问题,弗兰克甚至试图证明文献中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相关的一些地名是在拉达克境内,全然有悖于西藏传统中公认的拉萨东南雅隆河谷的观点,其“以拉达克作为吐蕃王朝摇篮的观点是先入为主之见,是毫无依据的”。

(三)《西部西藏史：一个未知的王国》(*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one of the unknown empires*)²³

《西部西藏史：一个未知的王国》一书出版于1907年,全书共包括自序、序言(F.W.托马斯撰)、插图目录、绪论,正文15章,附录2,插图24,地图4。

弗兰克在“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所使用的资料类别及来源,包括西方文献、汉文文献及藏文资料。对《拉达克王统记》等藏文写本以及藏文石刻资料的内容和史料价值尤为着重进行了论述。

正文部分的15章内容依次为:1、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西部西藏族群的记载;2、“门”部族(the Mons)进入西部西藏;3、达尔德人的迁徙;4、汉文文献中关于西部西藏的记载(约640-760 A.D.);5、藏-达尔德诸小王国(the Tibeto-Dard Kingdoms)时期(约500-1000 A.D.);6、中部西藏王朝(the Central Tibetan Dynasty)的创始及其早期诸王(约900-1400 A.D.);7、伟大的改革家宗喀巴时代及最初王朝的衰落(约1400-1580年);8、巴尔蒂战争时期(约1560-1640年);9、伟大的蒙古战争(约1646, 1647年);10、王位继承权之争(约1680-1780年);11、末期二王(约1780-1834年);12、西部西藏帝国(the Western Tibetan Empire)的衰落(1834-1840年);13、征服巴尔蒂斯坦(1841年);14、与卫藏之间的战争(1841-1842年);15、传教士的回忆。

“附录”包括两部分:附录一,仁恰纳·博迪的事迹(Rinchana Bhoti's Career);附录二,拉胡尔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Lahoul)。

23 A. H. Francke, *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one of the unknown empires*. London: S.W. Partridge & Co., 1907 (first published). Revised edition by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Delhi, 1998.

对拉达克历史研究学术历程的回顾，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弗兰克的这部历史著作。

第一部关于拉达克历史的著作是亚历山大·肯宁汉 1854 年出版的《拉达克：自然、统计与历史》。肯宁汉具有出色的资料搜集整理能力，在书中对拉达克的概述里，据当地的一份编年史料梳理出约 1580 年以来的一段历史简况；然而对于乔玛·柯拉斯（Csoma Körösi）所言当地存在一份更早时期的叙事史这一观点，肯宁汉却予以质疑，后来的事实证明肯宁汉的质疑是错误的²⁴。

此后，《拉达克王统记》藏文文本的发现和持续研究，以及对拉达克地区古代藏文摩崖石刻资料的搜集整理，使历史资料极大丰富，编写一部更丰富、翔实的拉达克历史已经成为可能。作为一位对上述两类文献的价值有充分认识、并且有杰出研究成果的学者，弗兰克对当地藏语方言、民俗、口述史、考古等方面的兴趣和开拓性贡献，都为其撰写这部新的拉达克史打下了坚实基础，弗兰克在本书“绪论”中曾以一段文字分别列出各章内容所依据的资料，主要即为当时新发现的藏文写本、石刻文献资料及搜集的民谣。尽管弗兰克在“作者自序”中自称此书仅是一本通俗读物，并不是一部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历史著作（a scientific history），使用的许多文献资料尚需详加勘别考证；但在西部西藏的研究史上，这本小书被一致评价为奠基之作。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托马斯（F. W. Thomas）为本书所撰“序言”中，高度赞誉了弗兰克在拉达克地区各领域研究中的先驱贡献。

弗兰克所使用的 Western Tibet 这一概念也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和讨论。在 1908 年《地理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刊发的一篇书评中，首先赞誉了该书所依据资料的丰富性，继而指出尽管作为一部历史作品而不是地理学著作，但弗兰克对“Western Tibet”这一概念的界定不清晰，也许该词意指拉达克，但实际上斯比提、拉胡尔固然是藏文化区，但库鲁（Kulu）地区却是印度斯坦人居住区²⁵。

（四）《印度藏区的古代遗物》（*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2 Vols,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 1926*）。

这部著作在英印政府的主持下由先后出版的 2 卷组成，第一卷《个人考察记录 / 日记》（Vol.1 "Personal Narrative", Calcutta, 1914）为弗兰克受印度考古局委任于 1909 年对印度境内的西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的全程考察记录；第二卷《拉达克王统记及其他小编

24 F.W. Thomas, "Preface", in A.H. Francke, *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one of the unknown empires*, 1907: vii-viii.

25 W. Broadfoot, "Review: Western Tibet",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31, 1908(3): 320-331.

年史》(Vol.2,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and Minor Chronicles: Text and Translations, with Notes and Maps", edited with foreword by F.W. Thomas. Calcutta, 1926), 则整理出版了弗兰克考察期间所搜集编年史及其他文献。

《印度藏区的古代遗物》第一卷实质为印度考古局在拉达克等地藏区进行的首次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由当时代理印度考古局事务的沃格尔(J.P.H. Vogel)撰“编者序”中, 对此次考古调查的缘由、方案路线等予以简要介绍。曾经构建了古代西藏西部小王国而当时已实际由印度管辖的西喜马拉雅高原山区(即此书中所谓 Indian Tibet, 确切意为“印属藏区”或印度藏区), “从未有一位既通晓当地历史和古代遗存、又掌握藏语文的学者对该区域进行过考察, 而弗兰克博士多年来在拉达克和拉胡尔长期居住考察并取得了罕见成就, 所发表的《西部西藏史》等一系列著作已闻名学术界”。除了弗兰克的学术禀赋和造诣, 他在这一特殊区域的田野工作能力也是被选中担任这一任务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惟有弗兰克博士适合担任这项工作, 是由于此前他在印度藏区山地间游历的磨炼, 使他能够忍受必将伴随在这个荒瘠之地探险旅途中的困乏、艰险”。因此, 在时任英属印度政府考古局局长约翰·马歇尔(J.H. Marshall)的推荐下, 印度政府向摩拉维亚教会委员会提出特别申请, 借调弗兰克对当时印度管辖的西部西藏地区进行一次考古调查。

考察的详细方案由约翰·马歇尔亲自与弗兰克讨论后确定, 计划于1909年夏季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 State)区域内展开尽可能详细全面的考察, 因为在当地保存有一些著名的藏区古代遗存但尚未得到精确考察。除常规路线之外, 可以途经印度藏区的两侧进入克什米尔, 即拉胡尔或斯比提。拉胡尔此前已有沃格尔博士做过考察, 因此弗兰克的工作就是从斯比提一侧进入克什米尔。考察组成员还包括印度政府委派的摄影师1名, 以及弗兰克自己雇用的厨师兼背夫1名、协助识读和抄录题刻文献的藏人1名。

1909年6月14日, 弗兰克从西姆拉启程开始考察之旅, 穿越巴沙尔(Rūmpur-Bashahr, 英属印度时期的巴沙尔土邦, 现部分地域属于印度喜马偕尔邦的金瑙尔和西姆拉地区)抵萨特累季河谷(Satluj Valley, 中国阿里境内称象泉河), 经杭(Hang)山口到达斯比提。然后翻越帕让(Pharang)山口, 沿措莫日日(Thsomo Riri)湖荒凉的湖岸穿越茹学(Rubshu)地区。再翻过颇洛贡卡(Phologongkha)山口和踏朗(Thaglang)山口, 才能抵达古代西部西藏的中心区域——拉达克。在古拉达克王都列城短暂停留后, 弗兰克继续西行, 翻越颇托拉(Photho La)、纳米卡山口(Namika Pass)、索吉拉(Zoji la)山, 于10月16日抵斯里那加(Śrīnagar, 当时克什米尔土邦的首府)。为期4个月的考察途中, 基本靠步行, 但旅程的艰辛丝毫不减弗兰克考察的学术热情, 并获得丰富

的发现。品第·拉尔 (Pindi Lal) 作为一位出色的助手及令人愉悦的同伴, 担任考察的全程摄影、摹拓题记工作。印度考古局执行总监 H. 哈格里夫斯 (H. Hargreaves) 协助绘制了考察行程详细地图。考察报告由当时代理马歇尔职务的沃格尔安排出版。

《印度藏区的古代遗物》第一卷在编者序言、作者自序之后, 主体内容由简介、正文、附录、索引四部分构成。正文按考察行程及地域范围共分四章, 第一章“萨特累季河谷”, 第二章“从萨特累季到印度河谷 (Indus)”, 第三章“印度河谷 (a. 拉达克; b. 列城)”, 第四章“从印度河谷到杰勒姆河谷 (Jehlam)”。“附录”共四项, 依次为: A. 调查中搜集遗物目录 (其中属于“英印政府搜集品”名义的一部分保存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 另一部分则作为克什米尔土邦的搜集品, 收藏于斯利那加的普拉塔普·辛格博物馆 (Pratap Singh Museum)); B. 搜集写本及木刻目录; C. 曼迪邦热瓦萨尔随笔 (Note on Rawālsar, Manḍi State); D. 巴沙尔土王年表 (Rajas of Bashahr)。“索引”列出全文中提到的地点、历史人物、专业术语及页码。卷一附图版 45 幅, 插图 4 幅, 另还附有详细行程表。

弗兰克的考察日记极为详尽地记录了考察的行程、路线, 考察中的收获及相关人物, 反映出他在考察中关注的对象包括寺庙、佛塔、墓葬等古代遗址, 以及摩崖石刻、造像、藏文题记、写本, 小件器物如各种材质的饰物、法器及生活用具, 擦擦, 等, 丰富全面地展示了当地的历史遗存面貌。由于印度政府没有批准他越过边界进入中国西藏阿里的提议, 弗兰克虽然遗憾地与神往已久的托林寺和扎布让擦肩而过, 但今西藏以西古格王国时期的许多重要寺庙均经弗兰克的踏访考察, 对寺中的主体建筑、塑像、壁画、藏文题记、寺藏藏文写本的保存状况, 各类遗存的题材内容、学术价值均做了简要记述; 并尽力阻止了对寺内早期壁画的“维修改绘”行为, 使塔波寺主殿内的壁画免遭毁灭之灾²⁶。

除了遍布西部西藏的佛教遗址, 弗兰克此前就对拉达克地区的墓葬一直格外关注, 曾于 1903 年对列城附近河谷中的墓葬做过发掘。作为西部西藏历史上的中心之一, 拉达克地区保存有大量重要遗存。弗兰克考察队一行在拉达克首府列城附近停留了共约 4 周时间, 期间于 8 月 23-28 日对列城河谷一处墓地进行了发掘 (与 1903 年发掘在同一地点), 并对墓葬形制、规模、出土遗物有详细记录。出土物包括手制陶器 (陶罐、陶盘)、陶片, 人头骨、羊头骨、牛角, 以及大量小件铜器物 (其中有上百件是浮雕圆形纹饰的方形小铜片, 不能确定是作为饰物或货币, 用途不详; 另还有大量大小、形状不同的铜扣,

26 A.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 I, 1914: 37-43.

背面有环，弗兰克推测可能是古代官员佩戴以区别职衔的标识；一些铜饰件），少量玻璃珠、铁器、金器。通过对墓葬的综合分析，弗兰克讨论了其族属和断代问题，认为属于大约公元 1-500 年之间一支来自北印度的雅利安人（弗兰克著作中称其为 Dards，“达尔德人”）²⁷。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揭示西部西藏在“前佛教时期”文明面貌的重要环节。

《印度藏区的古代遗物》第二卷实际收录了弗兰克于 1914 年之前在西喜马拉雅历次考察中搜集的有关各地历史的藏文写本及当地人的口述记录，并不仅限于 1909 年英印政府考古局委托调查项目的收获。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第二卷直至 1926 年才出版，但也因此，弗兰克在编录中收入了后来获得的其他资料，并对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拉达克王统记》得以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此卷由托马斯（F.W.Thomas）撰写序言，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拉达克王统记》（ལ་དྭགས་རྒྱལ་རབས།，内容包括藏文，英文译文、注释），《小编年史》（Minor Chronicles），并附地图 5 幅。关于《拉达克王统记》的研究上文已有详细介绍。《小编年史》部分共收录文献 23 种，大致为拉达克之外其他地区的编年史，诸王、大臣、首领的名录或谱系，如桑噶（ཟངས་དཀར་）、季丹（ཅིག་ཏན་）、拉胡尔等地编年史，桑噶地区桑拉（གཟང་ལ།）附属小王名录，古格诸王、索（སོད་）首领、巴尔蒂各地首领谱系等，以及部分口述史记录。西部西藏的文献记载极为匮乏，上述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勘别使用对西部西藏历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弗兰克与西部西藏考古的开端

弗兰克对西部西藏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研究以语言学和语文学为出发点，解读藏语及其他语言，尤其是布农语（Bunan）、Tinan 语和拉达克语（Ladakhi），搜集了许多重要藏文文献（包括摩崖碑铭、写本、刻本、口述史记录等）并予以翻译解读，在此基础上研究西部西藏的历史、宗教和神话。作为摩拉维亚教团工作的一部分，他同样致力于在较为封闭的西喜马拉雅山区传播现代教育，刊行了第一份藏文报纸。他的研究即使在现在看来，仍然堪称多学科视野及方法在藏学研究中的典范，而在 20 世纪初的欧洲学术界，这种可谓超前的学术探索或也未能免遭质疑。现执教柏林大学藏学讲席的托尼·赫伯（Toni Huber）博士在追溯柏林大学藏学研究学术史，评价弗兰克的学术成就时写道：“与此前在柏林大学教授藏文和藏学的其他学者不同的是，除了语文学和

27 A.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 I, 1914: 71-74.

语言学能力之外，他拥有长期在传统藏区（拉达克及相邻的其他西喜马拉雅地区）居住和田野工作的经历。这体现在他关于歌谣和音乐、婚姻制度、西部藏语方言、民间仪式、题刻文字、格萨尔史诗、地方史、苯教及其他多领域的诸多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上，这显示出对当时在语言与佛教文献领域主宰着德国东方学家藏学研究的基于语文学的学术传统的强烈背离。”²⁸

弗兰克的研究实际体现出在藏学领域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学术取向，这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或许正因为此，而被视为是对当时“基于语文学的学术传统的强烈背离”。弗兰克的众多成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但以往学者的评述对他在考古领域的工作涉及不多，下文着重对他在西部西藏考古史上的贡献试做探讨。

（一）弗兰克在西部西藏考古领域中的开创性贡献

1、对西部西藏古代藏文碑铭的系统搜集与整理

与当时欧洲多数东方学家更专注于语文学研究的书斋式学术传统相比，弗兰克在重视语文学、语言学的同时，也强调田野实地考察，如《西部西藏史》“绪论”中，弗兰克就列出 25 个重要的遗址地点，“以备需要旅行指南或田野考察指南者”。正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除了编纂刊行的西部西藏摩崖古藏文题刻，以及受英印政府考古局委托进行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考古调查和出版的两卷本考古报告，弗兰克还在《印度古代文物》(The Indian Antiquary)、《印度碑铭》(Epigraphia Indica)、《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RAS) 等印度考古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考古主题的文章²⁹。

关于弗兰克在古代藏文石刻碑铭方面的研究，上文已做详细介绍，大约与其同时期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只有罗振玉、L.A. 瓦德尔 (Laurence Austine Waddell, 1854-1938 年)，三者对西藏中部拉萨唐蕃会盟碑的研究均可谓开其先河，但弗兰克对西喜马拉雅古藏文

28 Toni Huber and Tina Niermann, "Tibetan Studies at the Berlin University: A Institutional History", in *Tibetstudien: Festschrift für Dieter Schuh zum 65. Geburtstag*, 2007:95-122.

29 "Rock-carvings from Lower Ladakh". [1] *The Indian Antiquary*.31. 1902:398-401; [2] *The Indian Antiquary*. 32. 1903: 361-363; [3] Leh: 1902, 10 pp. "Archaeological notes on Balu-mkhar in Western Tibet". *The Indian Antiquary*. 34. 1905: 203-210. "The rock inscriptions at Mulbhe.", *The Indian Antiquary*, 35, 1906: 72-81. "Kleine archäologische Erträge einer Missionsreise nach Zangskar in Westtibet".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60.1906:645-661; 61.1907:645-647. "Archaeology in Western Tibet". *The Indian Antiquary*.35.1906: 237-241; 36. 1907: 85-98, 148. "Archäologische Expedition an der indisch tibetischen Grenze". *Umschau*.14.1910: 666-668. "Tibetan inscription on the stone monument in front of the Ta Chao Ssu in Lhasa, 822 A.D.", *Epigraphia Indica* 10, 1909: 89-93; 11, 1910: 273-275. "Notes on Sir Aurel Stein's collection of Tibetan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RAS*, 1914: 37-59.

题刻搜集、整理的广泛与系统性则是同期卫藏地区碑铭研究所远不能及的。弗兰克对此领域的关注源于他对藏文碑铭价值的客观认识,《西部西藏史》“绪论”中,弗兰克即列举了石刻中出现的几位拉达克王的名字,他们在《拉达克王统记》中均有记载,以此说明拉达克藏文碑铭资料的可信,以及碑铭与写本之间可互为补证。但弗兰克搜集整理的西喜马拉雅藏文碑铭在此后数十年间并未能获得更多研究与运用,甚至在伯戴克1977年出版著作《拉达克王国》的第一章,对相关历史文献梳理时,仍然认为:

拉达克历史的主要文献来源是(而且以后也仍会是)约成书于17世纪的《拉达克王统记》。……拉达克的藏文题铭基本刻在岩石上,有少数是纸张贴在墙壁上,……这些资料的可信度不高。多数铭文都是据肉眼辨识,有些由弗兰克、有些是由其当地的助手抄录,且常常过于匆促。甚至有一则铭文当时已湮没不存,而据一些声称曾见过的当地农人口头复述抄录。弗兰克搜集的石刻铭文中,有少数可据图齐教授1928-1931年拍摄照片对勘,有些为我本人于1975年至现场对勘;对勘结果显示弗兰克及其助手的录文并非完全准确。当然,我们仍应庆幸拥有这些资料,因为在弗兰克之后再没有人继续搜集、研究拉达克的碑铭。至于这些碑铭资料对我们的价值,实则相当低。其内容通常是宗教性的,多记载造像、玛尼墙等的供养情况,从社会、经济、政治史的角度看用途甚小。³⁰

伯戴克对碑铭题刻文献价值的认识颇可商榷,20世纪中后期,黎吉生(H.E. Richardson)、王尧、李方桂等学者对西藏中部及东部地区吐蕃碑铭的考证,极大推进了吐蕃史研究,古藏文金石铭刻、敦煌写卷、新疆等地出土藏文简牍成为吐蕃史的三大重要文献资料,金石铭刻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³¹。不过,伯戴克对弗兰克搜集碑铭中存在问题的批评却很客观,涉及碑铭或金石学研究的学科方法和规范。中国古史研究有悠久的金石学传统,在金石文献的资料采集、保存、录文、校勘上早有规范,拓片工艺的精深和普及是资料采集、保存、后期研究的技术保障;而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印度的碑铭学研究刚刚初步建立,资料采集的科学性仍亟待技术方法上完善,多数碑铭学著作或文章均未附原始摹本或照片,不利于后期研究及其他学者的对勘,因此弗兰克在藏

30 Luciano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 (C.950-1842 A.D.)*, 1977: 3-4.

31 任小波:《古藏文碑铭学的成就与前景——新刊〈古藏文碑铭〉录文评注》,《敦煌学辑刊》,2011(3): 164-176.

文石刻碑铭中存在的问题蕴含着时代的局限性。

2. 藏区佛教考古艺术多视角研究方法的初探

《印度藏区的古代遗物》卷一“考察报告”虽然并非规范的正式考古报告，但透过弗兰克丰富详实的记述，他对藏区佛教寺院考古调查的方法与思考清晰可见。其考察的内容包括寺院平面布局、测量、绘图，主体建筑、塑像、壁画、藏文题记、寺藏藏文写本的保存状况，各类遗存的题材内容、断代、学术价值等，所体现的考古、艺术、文献研究的综合视角，也是自图齐之后藏区佛教考古中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

今阿里地区以西古格王国时期的重要寺庙如纳科寺（Nako，位于今印度喜马偕尔邦金瑙尔区）、塔波寺（Tabo，位于今印度喜马偕尔邦斯比提区）、阿齐寺（Alchi，位于今印度查谟与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地区）等均经弗兰克的踏访考察并留下了堪称最早的科学考察记录，对塔波寺及其中主体殿堂甚至做了基础的平面测量并据此绘出平面图。弗兰克对寺内雕塑、壁画的题材也进行了初步判断，限于当时对藏传佛教艺术的整体认识，部分题材的判断并不准确。例如，塔波寺主殿朗巴朗则拉康殿内墙壁上 32 尊圆形背光中的泥塑像，当时寺中的喇嘛无人能解释其身份名号，弗兰克认为应表现的是 33 尊印度教神。现在相关研究已较以前充分，可知实为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 33 尊曼荼罗。

写本及其研究价值在藏区考古与艺术中的意义不容忽视。塔波寺朗巴朗则拉康殿内两侧不规整地堆放有高约 5 英尺的数百叶藏文写本，弗兰克没有忽略这些散乱的纸张，初步判断为龙树所著《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藏文译本，此经由仁钦桑布译成藏文，而且极可能有大量抄本被保存在仁钦桑布所建寺庙中。并在记述中写道，他曾在三处地点发现具有仁钦桑布时期书写特征的《般若经》写本，“但无一能像塔波寺所藏的这部写本这般完整，其对校勘学有巨大价值。因为目前我们所知的《般若经》一类文献仅限于现代抄本或木刻本，但在塔波，我们找到了一部大译师时代的文本”。

弗兰克极为重视寺院墙壁上书写的藏文题记，因为其中蕴含着准确可信的历史信息，同时也具有古文字学价值。在塔波寺的考察记录中，他写道：“（塔波寺）墙壁上以黑色墨汁书写的题记，其重要性较写本要大得多”。在大日如来塑像后面、正好地面以上的位置，发现了两段很长的题记，内容可分为几种，其一是历史性的文字，记载了建寺时间以及相关人物（在“神子菩提萨埵〈ལྷ་འབྲུང་ལྷུང་ལེམས་དཔལ་།〉创建塔波寺 46 年之后，古格国王绛曲沃改建”），除了以上两位王室人物，题记中还包括当时最重要的两位高僧，即仁钦桑布和阿底峡；另一类是劝诫性的，尤以警示为多，详述对不守僧律的喇嘛所应施以的种种惩罚。这些约公元 1050 年绛曲沃时期的题记对于藏文古文字学极其

重要，其书写方式与早期和晚期（即宗喀巴时期）都不同³²。

在对塔波寺、阿齐寺 11 世纪壁画题记考察的基础上，通过与新疆安迪尔（Endere）出土古藏文写卷、西藏中部的两通吐蕃碑文（桑耶寺碑，赤松德赞时期，约 780 年前后；唐蕃会盟碑，赤祖德赞时期，823 年立）的对比，弗兰克总结了约 8 世纪吐蕃古藏文与 11 世纪塔波、阿齐寺藏文之间正字法的异同。安迪尔所出早期藏文写卷具有如下正字法特征：（1）元音反写；（2）部分词中，音节的末尾辅音字母写在第一个字母（此应指基字字母）的下面；（3）名词后缀多使用 ལ 和 ལོ，而不是一般常用的 ལ 和 ལོ；（4）通常使用的 ཅ 和 ཅོ 多代之以 ཅ 和 ཅོ，而且 ཅ 和 ཅོ 之前多用前加字 ག, ག, ག；（5）用 མི 或 མི 代替 མི 或 མི；（6）末尾辅音字母 ར, ལ, ལ 之后加再后加字 ག。而塔波寺、浦寺（Poo）、阿齐寺的 11 世纪藏文仅仅保留有安迪尔写卷藏文的第 5、6 项特征。在阿齐仅发现一例反写元音 ཅ，很可能是限于书写空间所致，由此推测，使用反写元音 ཅ 的藏文一般应早于 11 世纪。弗兰克还认为，约 14 世纪前后《甘珠尔》《丹珠尔》的编纂标志着藏文正字法改革的新纪元，མི 或 མི 中的下加字 ལ，以及再后加字 ག 于此消失。14 世纪之后的藏文正字法基本保持稳定，从字母的加字规则、元音基本标在基字上这些特征就可以判断出³³。关于吐蕃古藏文的书写特征，及历史上几次藏文厘定前后的正字法的变化，在当代藏学研究中已经有较深入的总结³⁴，但就笔者所见，弗兰克应该是最早对此进行分析并将其作为一种断代方法加以运用的学者。

弗兰克也在考察报告里写下对藏区考古工作特殊性的一些思考：

多数藏区寺庙中昏暗的光线对考古研究来说是巨大的障碍，因此我的工作方式不得不区别于在庞贝或新疆沙漠中。在后两处地点，任何发现的器物都具有价值，必须取出来、贴上标签并放好。但在塔波这样有人居住的古代遗址里，我却只能在数百条题记和艺术作品中挑选出那些会对藏区历史和艺术研究有真正

32 A.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 I*, 1914: 37-43.

33 A.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 I*, 1914: 92. 弗兰克在文中对藏文正字法进行分析对比时，采用了藏文的拉丁转写方式。该书中没有注明所使用的详细藏文拉丁转写方案，但依据行文中出现的拉丁转写，并结合藏文拉丁转写方案的出现与发展史，弗兰克采用的可能为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于 1902 年提出的藏文拉丁转写方案，这也是国际上正式出版的最早的藏文拉丁转写方案。详可参 Sarat Chandra Das, *A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Calcutta: The Bengal Secretariat Press, 1902: xvii.

34 详参巴桑旺堆：《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3）：61-81。Cristina Scherrer-Schaub and George Bonani, "Establishing a typology of the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编《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299-337。

价值的，这就意味着要在光线极差的地方对大量遗物和记录做近距离观察。只有最终做出抉择之后，我们的第二步工作比如摄影、抄录文字等才能展开³⁵。

3. 体质人类学在西藏考古中的早期尝试

在一些早期墓葬的调查及试掘中，除了对墓葬的大概形制、出土陶器和金属器物的简单描述之外，读者还会意外地发现体质人类学方法在藏区考古中的最初尝试。在1909年夏的拉达克考古调查中，弗兰克对列城河谷一墓地中出土人骨进行了测量。在其中一座墓葬中，有15-20个人头骨（准确数目不详，因为弗兰克并非第一个考察这座墓葬的人）。1903年弗兰克与沙乌博士（Dr. Shawe）曾发掘此处墓地中的一座墓葬，沙乌博士带回3个头骨，因条件所限没有合适的卡尺，仅用一副普通圆规进行测量，所得数据为：3个头骨均为卵圆形，颅长及颅宽分别约为 $6\frac{3}{4} \times 5$ ， $6\frac{3}{4} \times 514$ ， $6\frac{3}{4} \times 514$ 英寸；而一个出自巴尔蒂斯坦穆斯林墓葬的颅骨则为 $6\frac{5}{8} \times 558$ 英寸。将以上数据转换为通常采用的颅指数（cranial index），则列城墓葬所出3个头骨为74.70，77.77，77.77，巴尔蒂头骨为82.82。1909年考察所见头骨因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弗兰克未能提供任何数据，仅凭借对颅骨类型的熟练观察断定，列城墓葬所出头骨是典型的长头颅人（dolichocrany），颅指数均在74-77之间。相比之下，列城下方墓葬中所出2个头骨（约为19世纪初死于天花时疫）则无疑属于短头颅人（brachycrany）。弗兰克认为，由于长头颅是拉达克地区达尔德人（Dards）的人种特征，因此列城河谷早期墓葬人骨的族属或许是达尔德人；至少不是藏人，而属于来自印度北部的族群。关于藏西地区早期居民的族属以及达尔德人的论题或许尚需更多论证，但就方法论而言，体质人类学对古代居民人种归属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为解决考古学文化谱系渊源和族属等问题提出若干可资参考的佐证。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西藏考古中至今仍然有大片空白，弗兰克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尝试和探索期待着新的证据与回应。

（二）相关学术背景因素分析

弗兰克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学术训练，而当时关于拉达克的了解非常有限，因而在对他的学术评价中一些学者认为“他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非常令人惊异”³⁶。“事不孤

35 A.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 I*, 1914: 42-43.

36 Hartmut Walravens, "The Moravian mission and its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Western Tibet", 1992: 159-169.

起，必有其邻”，弗兰克在西部西藏历史、考古领域的成就，必然有轨迹可探察。以下将从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欧洲藏学、印度考古、体质人类学几个领域的学术背景试做分析。

19 世纪的欧洲，伴随着欧洲各国对东方世界的交往与了解东方的需求，东方学研究蔚然成风，并极为重视对民族古文字的解读。在乔玛(Körösi Csoma Sandor, 1784-1842 年)、伊萨克·雅各布·施密特(Isaak Jakob Schmidt, 1779-1847 年，摩拉维亚传教士，东方学家，精通蒙古语、藏语)和安东·席弗纳(Anton Schiefner, 1817-1879 年，德国语言学家、藏学家)等影响之下，欧洲藏学这一新兴东方学支系初现端倪，但直到 19 世纪末才有一小部分印度学和佛教学者充分掌握藏语。随着摩拉维亚教团在中亚及西喜马拉雅的传教活动，出于在藏区传教的需要以及深入了解传教区的传统，在西喜马拉雅的传教士们编纂藏语词典和藏文文法辞典，并依托藏语文展开对西部西藏的研究，其学术渊源实则属于欧洲东方学及藏学体系。

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弗兰克的考古学相关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但印度考古学史的背景或许可提供一些线索。弗兰克在西喜马拉雅传教期间，正值英属印度考古工作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1861 年，北印度考古部成立，亚历山大·坎宁汉任考古总监(1861-1900 年在任)，对印度各地展开较详细的考古调查，调查涉及古钱币、题记、雕塑、建筑等，并发掘和确认了一些阿育王时期、笈多和后笈多时代的重要遗址。1902 年，约翰·马歇尔接任印度考古局局长(1902-1944 年在任)，印度考古工作在这一时期得以制度化、有序化。马歇尔借鉴古希腊研究的古典考古学传统，除关注印度遗存中的希腊文化因素外，还重新建立发展印度的碑铭学，将碑铭学作为当时印度考古局三大分支部门及职能之一(其余两项职能为：保护；探索与研究)，在考古局设“政府碑铭解读官”1 人；创立《考古年度报告》制度，要求“年度报告不仅包含官方的记录，也要负责修复工作和重要建筑、遗址的保护工作，在最新的发现和发掘过程中，要有插图”；于 1904 年制定《古代遗迹保护法案》。此外，还将英属印度分为六个大区，每个大区设考古监督官 1 名。克什米尔即属于新建立的六大区中的“北方区”³⁷。不仅弗兰克参与的查谟-克什米尔考古调查系马歇尔亲自推荐，列入英印政府考古局的工作范畴，在一些具体调查工作中(如塔波寺的建筑平面图，对碑铭和写本文献的重视等)也折射出此时期印度考古的进展。

虽然同为古藏文碑铭研究的开拓者，弗兰克与罗振玉所秉承的学术传统应该有所不

37 邹飞：《印度考古局发展史的四个历史时期》，《南亚研究季刊》，2015 (3)：77-82。

同，后者循中国传统金石之学，弗兰克则应受到了印度碑铭学研究及方法的影响。印度碑铭研究是伴随着18世纪晚期欧洲印度学肇始而产生的，19世纪期间逐步完善，所关注的主要为印度古文字如婆罗米文、佉卢文，关于碑铭的临摹复制、转写、释读、断代的研究规范已经初步建立，而且相关古铭文开始成为研究印度古代政治史、文化史的文献依据。1870年，以亚历山大·坎宁汉担任总监的英印政府考古部成立，对印度碑铭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1902年约翰·马歇尔担任印度考古部总监后，对古代碑铭的考察得以进一步系统开展，并纳入考古学体系中³⁸。弗兰克将印度碑铭学的研究方法与规范运用于西喜马拉雅藏区的古藏文石刻中，其学术贡献不容置疑，但同时，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资料采集中的科学性，等）也反映了印度碑铭学研究中的某些时代局限性，如前文中所言。

至于弗兰克对列城墓葬中人头骨的研究，又一次展现了这位兴趣广泛的学者对当时方兴之体质人类学学科的关注。19世纪中叶，体质人类学在欧洲获得重要发展，巴黎、伦敦、莫斯科等地及德、意等许多国家都纷纷建立人类学会组织，人种区分问题获得普遍关注。系统的人体测量方法从18世纪末开始由一些西欧国家的学者开始创立，或创立测量方法，或设计制造测量仪器，其中被誉为“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博物学家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 1752-1840年）创立了颅骨测量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1906年摩纳哥第13届、1912年日内瓦第14届“国际史前人类学与考古学会议”上讨论通过的颅骨、活体等人类学测量方法，成为国际通行的方法，迄今沿用³⁹。弗兰克在1914年出版的著作中即已采用以上方法和数据，提供了藏区考古史上最早的体质人类学案例。

弗兰克首次对西部西藏古代藏文石刻碑铭进行了系统搜集与整理，并综合运用考古、艺术、文献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对西部西藏佛教遗存进行考察，在古藏文碑铭研究、藏区佛教考古等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甚至尝试将体质人类学运用于西藏考古中。与此后被誉于西藏考古研究先驱的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年）、乔治·罗列赫（George Nicholas Roerich, 1902-1960年）相比，弗兰克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学术训练，而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除了对其个人禀赋、品格的敬仰之外，从学术史的角度探察，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藏学、体质人类学、印度考古及其碑铭学等都在此期间初步建立其现代学科体系，弗兰克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才有可能取得上述成

38 Richard Salomon, *Indian Epigraphy,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 Prakrit, and the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1-198, 199-225.

39 朱泓主编：《体质人类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11。

就，可谓得风气之先。拉达克等“西部西藏”地区作为古代西藏的组成部分，对其历史的研究也属于西藏古代史的范畴；弗兰克在上述地区的考古探索，与图齐教授及其后学者所建立的“西藏考古”的研究领域、文化特征、角度方法等均存在共性与联系。对弗兰克相关著作与成就的深入思考，是厘清西藏考古早期学术史的重要一环。

◆ 杨清凡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讲师